



忻州挠羊赛的审美性

李效珍

摘要: 山西忻州盛行着一项历史悠久、名为“挠羊赛”的摔跤运动。这是一项集普及性、地域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等多种特点于一体的民间体育运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忻州就被誉为“摔跤之乡”。2008 年 6 月,忻州挠羊赛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挠羊摔跤赛因此也成为了忻州一个富有显著地域性的文化象征符号。文章通过对挠羊赛的起源、命名、奖品设置、比赛规则和代表性传承人等方面的分析,对它所蕴含的丰富深广的文化内涵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词: 挠羊赛;摔跤;民族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7)05-0050-06

DOI:10.12064/ssr.20170508

Aesthetics of Sheep-carrying Wrestling in Xinzhou City

LI Xiaozhen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034000, Shanxi, China)

Abstract: Sheep-carrying wrestling is a kind of Chinese wrestling with a long history in Xinzhou city, Shanxi Province. It is a folk spor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ity, locality, entertain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As early as in the 1960s, Xinzhou was known as the Home of Wrestling. In June 2008, at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Xinzhou sheep-carrying wrestling was included in the 2nd list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wrestling, therefore, became a cultural symbol of Xinzhou with distinct local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non-sport professional,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se the origin, name, prize, competition rul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so as to make an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wrestling. It intend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which can be perpetual with vitality.

Key Words: sheep-carrying wrestling; wrestling; folk sport

0 引言

忻州摔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开始闻名于全国。1958 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摔跤锦标赛上,忻州选手张毛清一举夺冠。翌年,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又由忻州选手崔富海和代表解放军参赛的忻州籍选手高书文,荣登中国式摔跤不同级别的冠军领奖台,同时还有张毛清与另一名忻州籍选手赵保周,分别获得不同级别的亚军。当时的中国式摔跤分 8 个级别,金、银牌总数共 16 枚,而仅忻州选手就夺得了 2 金 2 银共 4 枚奖牌。1960 年 4 月,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在太原举行,崔富海等 5 名忻州(包括忻州籍)选手又总共夺得 5 枚金牌。连续 3 年之内,

忻州跤手捷报频传,在全国跤坛堪称独占鳌头。1960 年,在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上,忻州被誉为“摔跤之乡”。几十年来,忻州跤手在各级各类多种摔跤比赛和柔道比赛中,更是叱咤风云,战果辉煌,群星闪烁。2008 年 6 月,忻州挠羊赛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摔跤是人类一项最古老、最普及的竞技活动,而忻州跤手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忻州地区流行的一项名为“挠羊赛”的摔跤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挠羊赛早已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一道地域性文化景观,而绝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体育的真正面目,应该如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奥林匹克宗旨所定义的那样:使体

收稿日期:2017-10-16

作者简介:李效珍,女,山西忻州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E-mail:xzsfz@sina.com。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并建立维护人类尊严、和平的社会。”^[1]所以,对挠羊赛进行文化的审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从家国情怀到娱乐转型中的挠羊赛

挠羊赛盛行于山西北中部的忻州市(尤其是忻府区、定襄、原平一带,人们习惯简称为“忻定原”),是一项历史悠久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体育运动,也是中国摔跤赛的一个重要分支。“挠”,在忻州方言里就是“扛”的意思;“挠羊”就是指比赛最后的获胜者要把奖品——一只活羊高高扛起,骄傲地向观众宣告他(她)的胜利。

“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因此,研究体育起源及其根基文化,其实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2]关于忻州挠羊赛的起源,众说纷纭。据《忻县志》^[3]说:“北宋以前,忻州人民就喜爱摔跤。”^[3]但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北宋杨业创立说。北宋太宗时期,由于长城一带受到辽军侵扰,所以宋太宗就派杨业任代州(即今山西省东北部的忻州市代县一带)刺史,来对抗辽军。但宋太宗同时又恐才勇超群的杨业不服从朝廷管束,就暗中派潘仁美监视他。相对于凶猛的辽军来说,杨业的军队兵少将寡,他便心急如焚。后来,他采纳夫人佘太君的建议,平时组织百姓一起习武,以备战时兵源之不足。同时,为防止阴险狡诈的潘仁美借机陷害,杨业又以摔跤这种民间娱乐活动作掩护。于是各个村庄在传统节日之时,便会组织人们举行摔跤比赛。虽然潘仁美最后还是借故把杨业陷害死了,但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抗辽民族英雄,同时也为了继续抗辽御侮,保家卫国,就把摔跤活动世代传承下来,并渐渐演变为“挠羊赛”。

第二,南宋陈效婴创立说。南宋时期,抗金民族英雄岳飞,为了增强部队杀敌卫国的战斗力,便把摔跤作为军事训练项目之一。当时岳飞的军队中有一位忻州籍的士兵名叫陈效婴,在岳飞被害后,满怀悲愤回到了家乡。由于战乱频繁,他使用当年在军中所学的摔跤竞技教授父老乡亲,使他们既能健身,又习得一身御敌本领。由于摔跤还有很强的娱乐性,于是深受家乡人民的欢迎,故而世代相传,加之忻州水草肥美,牧羊较多,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挠羊赛”。

第三,金代王增寿创立说。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4]在《续夷坚志》中记述:“秀容^[5]东南双堡村王增寿,号为外力,善角抵^[6],人莫能敌……”

第四,元明说。如上第二种说法所述,忻州方圆

百里水草丰茂,适于养牧牛羊,闲暇时人们或于田间地头,或于街头院落,只要有一块平坦的地势,就三五成群拿活羊作赌注进行摔跤比赛以娱乐。最初只是随意的、自发的比赛,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为有组织的“挠羊赛”了。

第五,明末清初说。山西忻州的北路梆子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在古庙会的舞台上,但最初观众甚少。于是,有人便想出一招:唱完戏后再举行男女老少都喜欢看的挠羊赛,这样或许能把较多的观众吸引住。结果,这招还真灵。于是,唱戏之后再举行挠羊赛的做法相沿成风,渐渐成了当地的一个习俗。据此,有人便认为挠羊赛的产生时间应在明末清初。

任何一种体育活动的起源都与诸多社会和自然因素有关。在上述几种挠羊赛的起源说中,基本都涉及到了挠羊赛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相关人物和自然环境等。其中,前两种起源的说法虽然只是传说,但却与体育的军事战争起源说相吻合。《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7]。”这些记载说明“摔跤的起源与军事密切相关是不可置疑的”,而且据此可知汉民族“至少在周代,摔跤运动已经出现了”^[4]。忻州北部古有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忻定原又处于边关与太原之间,使忻州人民常常处于受异族欺凌的苦难战争之中。当抗敌英雄被害之后,他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通过摔跤运动来强身健体,以期保家卫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经过思虑或凭借激情的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8]从这样的起源传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忻州人民努力拼搏、奋起抗争的精神美,以及痛恨权奸、仇视敌寇,崇尚和怀念民族英雄的家国情怀美。后3种关于挠羊赛起源的说法,则无论认为挠羊赛起源于哪个时代,都揭示出“体育具有娱乐性是体育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之一”^[6]其中第四、第五种起源说法,尤能使人感受到举办挠羊赛时盛大火热的场面,第五种说法还明确的提到了挠羊赛同庙会 and 唱戏的密切关系,正如当地俗谚所说:“赶会唱戏不摔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摔跤,十里八村也来瞧。”至于第三种起源说法,笔者以为,从元好问的记述中虽不足以说明挠羊赛的产生时代,但从对王增寿“善角抵,人莫能敌”的简略叙述中,亦反映出当时忻州百姓常常以挠羊赛娱乐的情形。而且,从时代的早晚角度看,从前两种与后3种起源说法所揭示的原因来审视,可以感受到挠羊赛从家国情怀向娱乐性的



转型。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毋庸置疑地表现了忻州挠羊赛这一民间体育运动的源远流长,表现出忻州人民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向往和平的美好情操和伟大的创造力。

2 从挠羊赛看“羊文化”的内涵

当挠羊赛渐渐演变成为一项有组织的自觉的体育运动时,就要郑重地为其命名、设立奖项、规定比赛规则。前面已说过,挠羊赛的奖品是一只活羊(也可以是祭祀过神灵的活羊)。后来也曾经以猪、牛、自行车、摩托车、电视机等做过奖品,文革后期还曾以铁锹、《毛主席语录》读本、《毛泽东选集》和锦旗等做为奖品,现时代在某些较高级别的比赛中,奖品则除了活羊之外还要加赠礼包、名人字画甚至汽车等。不论奖项设置如何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挠羊赛”这一传统称谓恐怕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么,为什么要以羊作为奖品,并以羊来命名呢?

奖项的设置,“通常蕴含着很高的符号性、意向性和观念性”^[7]。

首先,以羊为比赛奖品,与忻州的地理环境和畜牧业情形有关。

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忻定盆地有个大湖,方圆百里,水草丰盛,是个天然牧场,这样的环境无疑非常适合养牛养羊。又据史志载,“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忻州全市共养羊432997只,占山西全省养羊总数的15.7%。每个村庄都有一群或几群羊,所以拿羊做奖品不是很困难。”^[8]

第二,更重要的是“羊文化”是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离不开物质基础,首先是畜牧业的发展。羊由于其性格温顺最早被驯化,加之羊肉味道鲜美,羊毛、羊皮还可以为先民保暖御寒等等,可见羊浑身是宝,从而解决了先民的温饱问题,是与先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之一。所以,羊伴随着中华民族步入文明,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影响着我国文字、饮食、道德、礼仪、文学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比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羊”为“祥也”,解释“美”为“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对“甘”的解释又是“美也”。就是说,“羊”为吉祥之物,“羊大为美”,是由于其味道甘美之故。“美”“善”“羲”“幸”“羨”“祥”“羹”“鲜”“羞^[注6]”等字,都是表现美好、吉祥与幸福等意义,或指新鲜、美味等,都和“羊”有关。再比如,《周易》之《归妹》卦的上六爻辞,就是一首与羊有关的优美歌谣:“女承筐,无实;士刲(音

kuī)。”“展现出牧场上男男女女剪羊毛的生产劳动场景。女子捧筐接羊毛,羊毛很轻,感到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男子持剪剪羊毛,像割剥羊皮一样,却看不见淌血”,“显示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渐趋丰富,透视出历史的进步”^[9]。

祭祀是中国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的大事。古代帝王祭祀宗庙社稷的祭礼,又有太牢与少牢之分。太牢是天子所用的祭礼,即牛、羊、豕;少牢是王公大臣的祭礼,即羊和豕,或只有羊。可见,无论是太牢还是少牢,羊都是不能缺少的。因为,羊在古人心目中,是可以与祖先神和社稷之神相通,带给人神佑福泽的吉祥之物。

前面已经说过,挠羊赛往往于庙会唱戏之后举行,而祭祀当然是庙会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以羊来命名摔跤赛并且把羊设为摔跤获胜者的奖品,显然也更切合庙会的氛围,更能起到娱神降福的作用。由于对“羊”这一象征吉祥美好事物的共同认可,挠羊赛便渐渐成为了一项具有宗教意味的重要仪式,常常把当地百姓聚集在一起,使他们从中找到某种集体的宗教的情感归属。“宗教情感是在群体聚集时产生的,敬畏、激励和喜悦的情感来自群体参与”,在参与的仪式中其“积极的膜拜作用在于强化集体意识”,并从中“获得了力量,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10]。

3 挠羊赛展示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之美

将挠羊赛的规则做一整理,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跤场:设在宽广的打谷场或戏台前的场地上(现在由政府组织的比赛则多在体育场举行),不铺垫子,不划范围。

跤手: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身份职业,不分体重级别,不分地域国籍,不分男女老幼,观众也可踊跃登场,一试身手。平时没有组织(没有队员、队长),只是比赛时自愿临时组成,自愿上场。

服饰:挠羊赛对衣着没有严格要求,没有统一的跤衣。上身可着衣也可赤背(所以民间又称之为“赤背跤”),下身裤子或长或短随其自便,腰带可以是一条较长的汗巾或是麻秧绳,但不准扎皮带(也可不系腰带)。允许光脚参赛。女跤手上身穿运动T恤,下身穿着同男跤手,获胜者称“挠羊女”。

基本比赛动作:由于比赛可以上身赤背,所以不允许攻击上身,不允许抓对方的脖子;只能攻击下身,但绝不能抓对方的裤子;可以抓对方的腰带,但腰带一旦被拽断,比赛必须立即暂停;如果对方在你



肩背上轻轻拍一巴掌,就是表示认输,你就不能再进攻;双方可以用脚踢对方的脚,用脚腿勾绞对方的腿,可以抱对方的腿等。绝不能互相击打对方,更不能触及对方的面部和阴部。

输赢:一跤见胜负,不作循环赛。如果上场后未能连续摔倒6人,则失去本场绕羊的权利,即被淘汰。此外,比赛中,除脚以外的身体任何部位先着地即判为输。如果甘心认输,则以单手触地一下,裁判即可宣布对方摔倒一人。赢者继续与新对手比赛,连胜6人为终胜,便被誉为“绕羊汉”;若连胜五人,却被第六位上场者战胜,便称为“破了”(也叫做“破羊”“保羊”)。

设施和比赛程序:开赛前,在台口两侧或场上竖一杆大旗、两杆小旗,旗面上各写“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等8个字。跤旗是供跤手来拔的,拔跤旗的人必须是曾经的“绕羊汉”。拔了跤旗的两个人,便成为该场摔跤比赛中对抗的双方代表和主人。当然,他们还要通过主办方负责人或公证人,经过共同协商,划分出甲队、乙队的预赛跤手。夜戏散后场内画圈为界。这时,一只身披红带或头戴红花的肥美绵羊被牵进赛场,拉开了绕羊赛的序幕。上场跤手一般由小到大(最初上场的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人),由弱到强。比赛结束后,获胜者将羊高高地扛在肩上,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向神灵示谢。

比赛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时间长短完全由比赛中参赛跤手的实力而定。不过,如果比赛很快就见了分晓,观众却意犹未尽,便还要接着重新开始。第一场称“绕头羊”,第二场称“绕二羊”……这样,比赛往往是通宵达旦地进行。

这样的比赛规则显然有着较强的随意性,而且极其简便易行。除了两面跤旗、奖品,有一个平坦的地方作为跤场外,绕羊赛几乎不需要其他任何体育设施,连摔跤队都是临时组建的。的确,它的外在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它同时也是庄严和神圣的,你看那将羊扛在肩上炫胜的举动多么富有仪式感!它之所以规定连胜6人为终胜,又蕴含着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或是“六六大顺”“天地有六合”之意等等。这又充分说明它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所以,它既是随意的,又是有秩序的;于自由中有约束,又于约束中有自由;在娱乐中含严正,又在严正中含娱乐;既有较为浓烈的原生态意味,又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加入某些新时代的元素,但它的基本特性和文化价值取向却似乎获得了某种永恒。特别是双方跤手在竞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既对抗又友善、刚柔并济的中和之美最发人深思。

究其原因,绕羊赛所体现出的融合之美,除了与中国古代普遍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忻定盆地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外,更与久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有关。

首先,忻定原一带地处山西北中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被异族统治之中,也经历了多次民族融合过程,是胡汉杂居之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势必有一个由抗争、防御到逐渐团结、融合的过程,即既要保持本民族的尊严,进行必要的抗争,又要在斗争中保持理性和节制,游刃有余,从而摒弃伤害性、血腥性,以达到异族之间最大程度的和谐共处和融合。尤其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酷统治,加之儒、道思想文化的深深浸染,历来以友善、和平、柔弱不争作为与人相处的行为道德准则。但当马背上的民族踏入中原土地之后,儒家文化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便渐渐吸收了游牧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元素。游牧民族由于长期与汉民族共处,其文化中也融进了农耕文化的文明理性的成分。这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不断的碰撞与交融,最终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而绕羊赛便是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非物质外化。换言之,历史上的忻州人民由于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便渐渐形成了一种兼具阳刚血性美与阴柔平和美、有理有节的良好社会道德行为规范。而良好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对于构建稳定文明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卢梭的契约论观点,当人的某些极端欲望被牢牢限制,缺乏宣泄渠道时,其中一些不良情绪易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情绪宣泄是人类个体的一种正常心理需求。然而,如何建立合法有效的情绪宣泄渠道,成为维护地区社会稳定的共同难题。”而绕羊赛“在合适时机以合法身份,实现了群体里成员情绪宣泄的合理需求”,“情绪宣泄后的人不仅变得更守规矩,还能表现出对社会的积极态度和高涨。这对于稳定当地社会秩序非常重要。”^[1]

再者,摔跤运动并不是只有汉民族才有,也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1982年陕西省长安客省庄K140号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匈奴角抵青铜饰牌(也称铜饰板),就是最早反映游牧民族摔跤的出土文物。青铜饰牌的画面,表现的是两个人上身赤膊,下着长裤,足蹬短靴,在森林中扭搏角力的情形,两人的身后还都站立着一匹马,被系在树上。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匈奴族摔跤与汉民族摔跤同其他方面一样,在竞技上也肯定有一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不断完善的经过。

绕羊摔跤比赛过程,更是一场扣人心弦、引人入



胜、充满挑战性的视觉盛宴。挠羊赛场上,双方同时都处于进攻和防守状态,双方都有场外指导运筹帷幄,布阵走卒。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挠羊赛不分体重,不分级别,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国籍,甚至不分男女,这样的混合性比赛雅俗共赏,也是它的看点和魅力之一,拼的就是智慧、勇敢和技巧。俗话说:“狮子滚绣球,好的在后头。”英雄好汉一般都在第五、第六个才上场。高手之间的较量真可谓棋逢对手、难分伯仲、胜负难料。这种情况下,往往出现高潮迭起,通宵达旦相持抗衡的局面。如何才能克敌制胜?最终究竟花落谁家?真是越往后越惊心动魄,越引人入胜和精彩漂亮,加上场外观众的喝彩呐喊,解说员的精彩点评,让现场的观众和跤迷们心神激荡,如痴如醉。

观看过程中,观众还可欣赏跤手的竞技动作美。忻州挠羊赛的动作主要有扑腿、勾子、绞子、抱腿等,在此基础上又千变万化,呈现出它多姿多彩的丰富美,比如如“抱腿”一招,就有41式之多,更是让观众充分领略到挠羊赛竞技的令人叫绝。再者,还可领略跤手们千姿百态的风格美:有的跤手果断出击,动若脱兔,以技取胜;有的跤手不慌不忙,静若处子,以智取胜;有的跤手初试锋芒,稍显稚嫩;有的跤手身经百战,沉着老练;有的跤手攻防技术全面,身手不凡……但无论竞技强弱,无论风格各异,赛场上的每一位跤手都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毅力、顽强拼搏的斗志,同时他们都恪守规则,行为规范,文明竞技,即使跑得再快、把对方抱得再高,最后也一定把对方轻轻放下。

因而,看挠羊赛不仅可以给人带来视觉的美感和感官的愉悦,更可以让人用心领会挠羊赛的内在精神美;既可以被他们的英雄主义情怀所感染,又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学到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以及社会中各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12]。

一般来说,审美是有时效性的。所谓时效性,是“指审美标准有着一定的时限”,“有着时代的特点”,要“受到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政治、宗教、文化等等的影晌”^[13]。然而,有些东西却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人们的审美标准有着怎样的改变,它依然具有恒久不变的美的特质。挠羊赛正是如此。

4 挠羊赛传承人的精神风貌

2009年,崔富海这位跤乡“摔跤世家”的第二代掌门人,具有传奇色彩的泰斗级领军人物,被评为“建国六十年感动忻府十大人物”之一,文化部又授

予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挠羊赛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称号。

传承人有“普通传承人”与“代表性传承人”之分。所谓“普通传承人”是指具有一定挠羊技艺,在挠羊活动中挠过羊的,并对挠羊民俗的发展起过一定影响的人。所谓“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据有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忻州挠羊赛普通传承人从民国至现在共有267人,代表性传承人有8位,其中有4位是省、市级,3位是市级^[14]。他们都对挠羊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崔富海是其中唯一的国家级(同时也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级别最高,年龄也最长,当然贡献也最大。

崔富海的父亲崔银忙,是当年闻名遐迩的挠羊汉,古稀之年还常常与年轻人过招,是崔家摔跤事业的开山鼻祖,并担任忻州南高村摔跤总教头达七十余年之久。崔富海的二哥崔贵海,是著名的民间挠羊汉。正是在父兄的积极影响下,崔富海也迷恋上了摔跤运动,上中学时便因参加忻州播明举办的挠羊赛而一举成名。崔富海献身跤坛已有五十余载,他不仅凭着自己过人的实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获得了数不清的个人荣誉,而且本着对摔跤事业的一腔赤诚和挚爱,为国家的摔跤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摔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崔富海还就摔跤抱腿技术写成《摔跤抱腿41式及应用》《续抱腿种种》《抱腿技术研究》等文,在全国摔跤界广泛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摔跤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崔家至今已有五代二十余人驰骋跤坛,参加海内外各类摔跤赛事无数,成绩卓著,蜚声大江南北。其中有国家级运动健将4名,高级职称4名,国家一级裁判2名,数人担任教练工作,可谓人才辈出。由于崔家对摔跤事业的杰出贡献,早在1983年,崔家就被原忻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摔跤世家”称号,1998年又被山西省摔跤协会再次授予“摔跤世家”称号。

如今,崔老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却依然精神矍铄,继续活跃在跤坛,为摔跤事业的发展发光发热。笔者通过对崔老的简短电话访谈,得知从2009年开始至今,他和家人投资四五十万的积蓄,在奇村镇南高老家筹建忻州首个摔跤挠羊文化大院。在大院建设过程中,政府从资金、人力等方面都予以了大力支持,现在已基本建设完善,但后续工程依然浩繁。崔老及其家人的理想是,不仅要把它建成民间青少年的摔跤培训基地,为忻州、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一批又



一批优秀的跤坛英才,使挠羊赛代代传承,长盛不衰,而且要将它建成忻州挠羊赛文化研究和展示的场所,使它成为忻州文化的一个看点。

跤乡“摔跤世家”除了忻府区的崔家,还有定襄朱家、原平刘家等。

一个家族由于有了一位或几位开创者,几代甚至代代皆有英才,除了给这个家族带来较大或巨大荣耀之外,“更重要的是让这个家族乃至这片地域,产生了绵延不尽、有韧性的传承力和生命力”^[15]。这种家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并不鲜见,而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5 结语

忻州挠羊赛是在特定地域和历史背景下,华夏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是一项将普及性、娱乐性、随意性、竞技性、观赏性等众多特性完美地集于一体的民间体育运动。它之所以能够历经千百年而不衰,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文化特质的永恒性,凝结了忻州人民向往幸福安宁、创造美好生活的聪明与智慧,蕴含着忻州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齐心协力、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是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同时也体现出追求和平、友谊、进步,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的现代体育文化精神,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和支持;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古往今来那些自觉自愿、不遗余力地为它的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和努力的众多传承人。挠羊赛不仅是忻州人民的一项伟大创举,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

注释:

【注1】忻县:即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

【注2】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

【注3】秀容:见注②。

【注4】角抵:音juéì,这里指我国古代体育活动项目之一,类似于现代摔跤。

【注5】角力:大致同“角抵”,即摔跤,是我国古代体育活动项目之一,通常为徒手相搏。现代摔跤运动尚借用“角力”之名。角,音jué。

【注6】羞:古代向王公贵族或宾客进献美味食品。“饘”的本字。《说文解字》:“羞,进献也。”《周礼·天官·庖人》:“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

参考文献:

- [1] 杨学文,吐尔干·努腊色力,孟欣欣.试论体育审美价值[J].体育文化导刊,2011(8):156.
- [2] 吕利平.旧石器文化与体育起源的考古学推论[J].体育科学,2013,33(06):93.
- [3] 山西省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4):523.
- [4] 周小娟.地理视角下的忻州摔跤挠羊赛[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4):34.
- [5] 马列著作选读(哲学)[M].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46.
- [6] 旷文楠.体育起源论略[J].四川体育科技,1985(03):14.
- [7] 路云亭.从原始荷尔蒙主义到现代法学体系:足球的世俗理性[J].体育科研,2016,37(4):29.
- [8] 独具特色的“挠羊赛”与忻州摔跤.三晋史话·忻州卷[M].陈义青主编.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6(8):236.
- [9] 郭兴良 周建忠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9
- [10] 曹月如.神圣的社会——涂尔干的宗教观和莫斯的巫术理论[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6):23.
- [11] 李玮,毛明春.民间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建构功能——以山西省忻州市挠羊赛为例[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5(04):106,107.
- [12] 陈安平,孟明亮,曲葆青.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挠羊赛”观赏价值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06):35.
- [13] 王旭晓.美,在你身边[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5):171,172.
- [14] 杜彩凤,张翔.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忻州挠羊赛传承人的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15(11):979,980.
- [15] 郇波.文化传承是家族兴旺的生命力所在[EB/OL].中国文明网.2016-09-13.http://www.wenming.cn/wmjt/jhj/hk/201609/t20160913_3692309.shtml

(责任编辑:杨圣韬)